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文化的解释

Clifford Geertz

[美国]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文化的解释

Clifford Geertz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文化的解释

Clifford Geertz

[美国] 克利福德·格尔茨 著 韩莉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解释 / (美) 格尔茨 (Geertz, C.) 著; 韩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6

(人文与社会译丛/刘东主编)

书名原文: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ISBN 978-7-5447-4226-9

I. ①文… II. ①格… ②韩… III. ①文化人类学—文集
IV. ①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72320 号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y Clifford Geertz

Copyright © 1973 by Perseus Books Inc.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rseus Books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434号

书 名	文化的解释
作 者	[美国] 克利福德·格尔茨
译 者	韩 莉
译 校	林振义
责任编辑	刘 锋 陈 锐
特约编辑	陶泽慧
原文出版	Basic Books, Inc., Publishers, 197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8.375
插 页	2
字 数	415千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226-9
定 价	5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

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前 言

vii

当一位人类学家在殷切的出版商的催促下,着手收集他的某些论文,以便对他自离开研究生院后十五年中的工作作一个回顾性的展示时,面临着两个困难的抉择:收集哪些论文以及如何以诚实的态度来对待收集进来的论文。我们所有这些为社会科学杂志写文章的人都有一本自己想像中的非书之书(non-book),而越来越多的人也正在把它们出版出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设想过去自己写的东西现在会写得更好,而且准备好了要自己修改而决不让编辑改动。想要从自己的行文中发现精巧的构思可能会同想在自己的生活中有所发现一样让人失望;事后(post facto)编一个进去——“这就是我过去想要说的意思”——是一种强烈的诱惑。

面对第一个抉择,我决定只收入那些与文化概念有直接而明显关系的论文。事实上,这些论文的大多数不是理论探求而是经验研究,因为当我离社会生活的直接体验太远时,我就会感到不舒服。但是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也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地研究它。虽然重新定义文化是我作为人类学家最持久的兴趣,但是我也在经济发展、社会组织、比较史学和文化生态学

领域里做了一些拓展——为了避免离题太远,本书就没有反映这些关注。因而,我希望,这一组论文看起来就像是一篇通过一系列具体分析而得来的论文,不要仅仅是一种“尔后我写道……”这样的对有些漂泊的职业生涯的回顾。这本书要进行论证。

第二个抉择不大容易处理。一般来说,我对发表过的文章采取一种 *stare decisis*(维持原样)的态度,即使仅仅是因为如果这些论文需要很大的修改,那就完全不应该重印它们,而应代之以能纠正错误的全新论文,也应这么做。况且,把改变了的观点写进早先的著作中来纠正自己的错误判断,在我看来不太光明磊落。这样做会模糊了选编自己的论文时首先想揭示的思想发展进程。

不过,即便如此,虽然争论的实质不受严重影响,但要是对原文一字不改,传达的就是过时的信息或因与现在已淡化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过于紧密而削弱了现在还有有效的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还是有正当理由,回过头去做一些校订。

在后面选收的论文中,有两处与我上面的考虑有关,因而我就对原来写的东西做了些修改。第一处是第二编中的两篇关于文化与生物进化的论文,原文给出的化石年代已被确切地替代了。这些年代,一般说是向前推了,这一变化基本上未触动我的核心论证,我认为引入比较新的测算没有坏处。在考古学已经发现四百万或五百万年前的化石后,再说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ines*)可以追溯至一百万年前就没有多少意思了。第二处与第四编第十章《整合式革命》有关,自这篇论文在本世纪六十年代写作以来,新国家历史的潮流——如果它应该这么称呼的话——已使其中的一些内容读起来很古怪。既然纳赛尔已经去世,巴基斯坦已经分裂,尼日利亚已经非封建化,共产党已从印

度尼西亚的政治舞台上消失,如果写得仿佛这些事件没有发生过的似的,会给讨论带来不真实的感觉,而且即使现在不是尼赫鲁而是尼赫鲁的女儿在领导印度,马来亚共和国已经扩大为马来西亚联邦,这个讨论我认为还有意义的。因此我在这篇论文中做了两类修改。第一,我变换了时态,引入了从句,添加了一两处脚注等等,从而在使论文的正文读起来不太像过去的十年没有出现过一样。但是我没有为了增强论证而改变任何实质性的东西。第二,我给每一个历史实例都增加了一段内容,概括自这篇论文写作以来与之有关的发展——而且清楚地与实例正文分开,以此来明确指出,假如有任何事件发生,它的发展显示出在这篇论文中以早先的事件为根据的讨论仍然与剔除过时事件(Rip Van Winkle)的影响有关。除了一些印刷和语法上的小更正(以及为索引风格一致所做的修改),本书的其他内容基本上没变。

不过,我增加了新的一章,即第一章,尽可能概括地表明我现在采取的立场。因为各章讨论的观点跨越十五个年头,在引论性的第一章中讨论某些事情的方式的确与出现在重印的某些其他章中的方式有些不同。我早先的一些关注——比如功能主义——现在在我的思想里已不太突出;而一些后来的关注——比如符号学——现在更突出了。但在我看来,这些论文中的思想走向是相对连贯的——它们的排列是按逻辑顺序而非年月顺序,而第一章代表的是一种努力,要更清楚、更系统地说明这一思想走向是什么:总之,努力说出我一直在说的东西。

我删掉了论文中原有的所有致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知道他们帮助过我,并且也知道给我的帮助有多么大。我只能希望他们至今还知道我也知道这些帮助。而我不再忙乱地提及他们,代之以对三个出色的学术机构的真诚的感谢:哈佛大学社会

关系系,我在那里受过训练;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我在那里教了十年书;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我现在在那里工作。在美国大学系统被抨击为不合潮流或日益恶化的时刻,我只能说,它一直是一份拯救我的礼物。

克利福德·格尔茨
一九七三年于普林斯顿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第一章 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	3
第二编	
第二章 文化概念对人的概念的影响.....	43
第三章 文化的成长与心智的进化.....	69
第三编	
第四章 作为文化体系的宗教	107
第五章 精神气质,世界观及对宗教象征的 分析	155
第六章 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 实例	174
第七章 现代巴厘人中的“内部转换”	205
第四编	
第八章 作为文化体系的意识形态	231
第九章 革命之后:新兴国家中民族主义的命 运	279
第十章 整合式革命:新兴国家中的原生情感与	

公民政治	303
第十一章 意义的政治	368
第十二章 政治的过去,政治的现在:关于运用 人类学研究新兴国家的札记	387
第五编	
第十三章 智慧的野蛮人:评克劳德·莱维—斯 特劳斯的著作	405
第十四章 巴厘的人、时间和行为	424
第十五章 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	484
索引	537

第一编

第一章 深描说：迈向文化的解释理论* 3



苏珊·兰格在其《哲学新解》一书中谈到，一些观念往往带着强大的冲击力突现在知识图景上。顷刻之间，这些观念解决了如此多的重大问题，似乎向人们允诺它们将解决所有的重大问题，澄清所有的模糊之处。于是，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把它奉为开启新的实证科学大门的秘诀，当做以此便可建构起一个综括一切的分析体系的中心概念。苏珊·兰格指出，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大观念(*grande idée*)的突然流行，一时间几乎排斥了所有其他的观念，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敏感而活跃的头脑都转向对这个观念的探索 and 开发。我们将它试用于每一个方面，每一种意图，试验其严格意义的可能延伸范围，试验其一般原理，以及衍生原理”。

然而，当我们熟知了这一新观念之后，当这个观念成为我们的理论概念总库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对这个观念的期望便会与它的实际用途趋于平衡，从而它风靡一时的过分状况也就结束了。少数狂热的信奉者还会坚持认为这个观念是理解整个宇宙的钥匙；但是不那么易受支配的思想者们不久就会冷静下来思

* 本章系于晓译。

考这个观念产生的实际问题,他们努力在它适用的地方运用它,在它能够扩展的地方扩展它;而在它不适用或不能扩展的地方就停止运用它、扩展它。如果这样的话,这种观念实际上就会变成一种尚待发育成长的胚芽,变成我们的知识武库中永久而持续的一部分,而不再具有它曾经有过的那种貌似宏伟阔大、允诺一切的范围,不再具有那种似乎处处适用的无限多用性了。热力学第二原理、自然选择原则、无意识动机概念,或生产方式的组织说并没有说明所有的东西,甚至连人的事情都没有一一说清,但是它们毕竟解释了某些事物;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注意力也就转向确定这些事物到底是什么,转向使我们摆脱这些观念在其最初盛极一时之际导致的大量伪科学的缠绕。

这是否是所有具有中心意义的重要科学概念的实际发展途径,我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模式和文化这一概念的发展相吻合,却是肯定无疑的。整个人类学便是围绕这一中心概念而兴起的,并且一直以不断增强的关注去限定、细述、专研和包容这一概念的统属范围。下面的各篇论文,正是以不同的途径、从不同的方面,力求去枝打叶,复原文化概念的本来面目,从而实际上确保其重要地位的连续性,而非往其上添枝加叶,以致削弱了它的基础。这些论文有时直言不讳地论争,但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具体的分析而论证,以求得出一种狭义的、专门化的,从而也是——我这样想像——理论上更为有力的文化概念,以取代 E. B. 泰勒著名的“最复杂的整体”的概念;因为,尽管他的概念的创新力不容否认,但在在我看来,似乎是模糊之处大大多于它所昭示的东西。

这种泰勒式大杂烩(pot-au-feu)理论方法会将文化概念带入一种困境。这在克莱德·克拉克洪的《人类之镜》一书中甚为明显,尽管这本书至今仍是一部比较好的人类学的一般导论。

在论述文化概念的一章里,克拉克洪用了将近二十七页的篇幅设法将文化依次界定为:(1)“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2)“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3)“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4)“一种对行为的抽象”;(5)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6)“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7)“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8)“习得行为”;(9)“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10)“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的关系的技术”;(11)“一种历史的积淀物”;最后,或许是出于绝望,他转而求助于比喻手法,把文化直接比做一幅地图、一张滤网和一个矩阵。面对这样一种理论传播的情况,即便是一个不完全规范但只要多少紧凑集中一些的文化概念也可算是一种改进了,因为它至少内在连贯,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提出可以界定的论据(公平地说,克拉克洪自己也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折衷的方法之所以自拆台脚,不攻自破,倒不是因为它只在一个方面有所用途,而是因为可派用场的地方太多;因此,必须加以选择。

我主张的文化概念(下列各文将试图论证这种概念的效用)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马克斯·韦伯提出,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我本人也持相同的观点。于是,我以为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我所追求的是析解(explication),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但是,这种见解,这种只用了一句话就说出来的学说,其本身就需要做一些解释。